

“大国经济史：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 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 纤

如何在“大国理论”的框架下研究诸如中国市场发展史、产业发展史、科技发展史、财政税收史、人口发展史等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又如何用中国经验丰富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大国经济史：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该研讨会于2020年11月28日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体制演变，从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视角来透视大国经济发展历史。下面就与会者提交论文以及大会报告的主要学术观点略作综述。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与财政制度

近些年来，国家治理与财政制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热点方向，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与财政制度也受到与会专家的重点关注。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从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出发，研究了其与大一统的关系。他认为，以士绅为核心的各类民间组织，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也广泛委托牙行、歌家等民间主体完成赋税征收与公共管理事务，实现对基层的间接管理；所以，朝廷可以通过较简短的委托—代理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官僚体系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降低大一统的管理成本，分散风险，从而实现对庞大国家的有效管理；基层自治具备产权制度基石，也是短缺经济与信息技术条件落后约束下的政府治理之道，这是当时的国家能力能够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颜色副教授集中分析了18世纪的中国如何在低税率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他通过构建1738—1820年的地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国家粮仓系统和精英服务事业(elite services)提供公共产品在缓解价格波动方面的效果。他认为，政府干预有效地平抑了军事威胁较大地区的粮食价格波动，而地方精英(local elites)则在其他地区发挥了这一作用，这表明国防威胁推动了国家资源的分配。

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教授考察了南宋财权分配与地方治理的问题。他认为，王安石变法以后逐步确立的“窠名分隶”的税权分配财政体制，到南宋成为财权分配的基本体制。二税正税、东南茶盐禁榷收入等重要赋税完全归属中央，商税、酒税等也被中央高比例分享，造成地方财政的困窘。但在此格局下南宋地方治理仍得以较好推进，个别地方官员还取得突出成效。他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官员设法扩大征收分属地方的赋税，获得财力以用于地方建设；二是官方主导下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地方事务；三是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引导建立社会的自运行机制。湖南师范大学彭丽华副教授对宋代的桥与场务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从汉唐的关市之征到宋代近桥而征的大量兴起，体现了宋代商

〔作者简介〕 宋纤，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师，长沙，410000，邮箱：songqian@hunnu.edu.cn。

税征收网点的密集化与商税征收的普遍化,这实际上为黄纯艳提出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补充依据。山西大学丁俊副教授采用《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与《唐仓库令》等历史文献资料,对唐朝前期的财政预算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无论是预算内的支费,还是预算外的超支部分,都采用诸州“自供”与就近外配的原则。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和市场发展

中国古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曾取得辉煌的成就。与会专家对中国传统社会工商业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政府对于工商业的限制方面。

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从所有权的角度对唐代工商业经济成分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唐代工商业经济包括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整体上形成官私二元的结构。私营私有工商业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唐代工商业经济实际上包括官营国有工商业、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三大类别,构成了“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的结构形态。武汉大学陈锋教授则关注了清代盐商获利方式的多样化问题。“官督商销”是清代食盐运销的主要形式,盐商通过这一体制,获取有别于一般商人的利润,从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一方面,在某些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盐商也有可能无利可图甚至亏折;另一方面,盐政官员、地方文武官员“视商家为可啖之物,强索硬要,不厌不休”,盐商利润受到肆意盘剥。为了维护盐商的正常运营,保证盐商一定的利润空间,借以保障食盐的正常运销和盐课的交纳,清廷曾采取补贴加价与加斤、加耗的措施,对盐商进行补贴。同时,盐商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也会采取一些类似于私盐的“浮春盐斤”“夹带盐斤”等非法营利手段,而“借官行私”。

中国传统社会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依然有所发展,它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唐清在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背景下,从生产供给与需求两端分析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形成。湖南师范大学曾雄佩博士通过探讨1600—1905年间印刷技术的变迁,发现书籍印制的市场需求对印刷技术的选择与推广起到了重大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宋纤博士对1841—1859年香港自由港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在香港自由港的发展过程中,英国政府、港英政府和社会各界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云南大学田晓忠副教授则分阶段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主要是先秦至宋元)传统市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他认为,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事实上已揭开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研究的序幕。而市场在中国被明确提出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剧,受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现实驱动,学术界对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市场及其发展史才开展了全面探讨。

此外,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妍从分析唐代服饰入手,探讨了服饰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她认为,尽管服饰的呈现,会因为朝代的政治理念、民族消费心理、地域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服饰的发展水平始终不能超过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限制,同时也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圣喆通过构建商业通达性系数,分析了两广地区各州对外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的便利程度,揭示了唐宋时期两广地区交通及各州交通地位的变化。

三、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难题

历史上大国兴衰交替似乎是平常之事。20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均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周期循环律。到20世纪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大国的崛起与衰落问题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大国兴衰、中西分流、李约

瑟难题、近代化等相关问题也成为与会专家探讨的主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隋代对唐代的影响。隋代在政治制度上确定了三省六部的雏形,这种制度设计直接影响了唐宋社会;隋代实行的“轻税之法”,系唐代“两税法”之先河;隋代大修运河,奠定了经济重心格局;隋代确定了唐宋及其以后文官制度的内核——科举取士;隋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张掖互市,基本形成了隋唐对外开放的格局等,表明隋代对于唐代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基于此,他认为唐宋变革概念的提出,似乎有就唐宋讨论唐宋之嫌,没有将其纳入长时段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中唐革命论”较“唐宋变革论”更能反映社会变化的实质。

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提出“大分流”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中日分流的问题。基于此,江西财经大学邱永志副教授指出,16—19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分流:16世纪以降,从货币发行管理权的视角看,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在建立近代货币金融体制的过程中呈现出更明显的分流。这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也彰显了国家金融能力的传统特质对构建近代金融体制的深层次作用,折射出历史遗产的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曾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假说也受到陕西师范大学豆建春博士的关注。他从土壤、耕犁和技术的长期演进的角度,使用动态经济学模型,对“高水平均衡陷阱”形成的原因和路径进行了相关分析。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基于19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档案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新式教育对银行职员工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而探讨了教育、人力资本与工资溢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式教育相对传统教育有明显的工资溢价,较高等度的学校教育具有较高的工资回报;新式教育的工资溢价主要来自于劳动者工作技能的提高,而不是信号效应;由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职员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和适应新工作的能力,因此晋升速度和部门调动(即在行内的工作经验)是实现其工资溢价的重要机制。近代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盛小芳研究了公司法、银行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联。她认为,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公司法的实施效果更好,对工业化的推动力更明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巍教授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经济传导机制就是首尾衔接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自动发挥作用。在理论上,这个传导机制可以透过诸多经济现象逐渐抽象出来,用以指引经济研究和经济绩效评价。

这次会议充分讨论了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与财政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商业与市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难题等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热点问题。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修正应建立在对经济史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反之,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运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也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高超群)